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罗本琦

摘要: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 20 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于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逻辑起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23)03-0001-05

作者简介:罗本琦,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安徽 安庆 24613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研究”(14AKS006)

收稿日期:2023-04-25

“两个结合”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重要论断。“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内涵和历史进程的高度概括,而合力启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是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方面的统一就是“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2]深入考察“两个结合”逻辑起点,研究其背后的原因,对于理顺“两个结合”的逻辑,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一、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时代呼唤

中国自秦汉以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高度耦合,一脉相承,即使是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也不曾影响到体制与文化的传承。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发展态势,西方人凭借坚船利炮将这个古老的帝国裹挟到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使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

社会革命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开创一个全新的中国;只有文化革命才能荡涤几千年积淀的古老文化,重新塑造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文化。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鸦片战争后,初步觉醒的精英们意识到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险时,也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局限,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的变革。“正是这种强烈的需要,激励着一批批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寻求真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撞击,形成五光十色的思潮相互交织的局面。于是,产生了‘经世致用’、‘三民主义’等以改变中国命运为直接目的的理论或思想,并在这些进步理论或思想指导下掀起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和试图通过制度改革挽救危局的维新变法,以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民族民主革命。”^[3]毛泽东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付出的一切努力,归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则是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旧民主革命的高潮。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使全方位改造旧世界成为可能。因此,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实际影响也决不局限于政治体制的变革。正如有学者评价辛亥

革命时所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它的意义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而且牵动着整个社会以至思想文化等方面。”^{[4]90}但辛亥革命终究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没有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没有摘掉中国人头上的“半殖民地”的帽子。革命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仍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制约,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每一个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军政大佬的背后,无不有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第二,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徒具形式,而且十分不稳定。革命所得,唯有“共和”之名,没有“共和”之实,即便是形式上的“共和”也难免受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冲击。一言以蔽之,辛亥革命没有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孙中山本人也在著名的遗言中感叹:“革命尚未成功”^[5]。第三,辛亥革命没有摧毁封建意识形态,更没有适时地开展“文化革命”。辛亥革命后没有形成支撑新的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更没有随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在社会层面普遍地移风易俗。封建意识形态仍然统治着中国,宗法思想及其一整套的“规矩”仍然支配着整个社会。辛亥革命后,曾有革命党人如是说:民国代清之后,“中国的国门,只换了一块招牌,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6]。陈独秀先生也曾无奈地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头上不反对共和制度,但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封建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只不过因为胆小,不敢堂堂正正地说出来。陈独秀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复辟帝制后,那些反对帝制的人们之中,一大半并不是真正地反对帝制,而仅仅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他们针对的是特定的人,而不是制度。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整个社会,投向广大的民间,还会发现:孕育了几千年的宗法礼教,更是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刻画的那样,照旧吃人。

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没有建构新文化的行动,是鸦片战争后以救亡为主旨、以制度改革为主要目标的民主革命的共同特征,也是变革或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的确有少数中国精英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不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努力引进西方制度文化。但是,反观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中国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传统文化尤其是没有把封建意识形态作为关注的重点,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深刻的检讨。精英阶

层的觉醒主要表现为对殖民者的警惕,对民族危亡的焦虑和对变革的期盼。在“怎么办”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窠臼。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进行,以不改变封建秩序为前提。洋务运动的初衷仅限于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后来扩展到近代工业技术和工业设备,至于中国既有的政治、文化甚至经济,是不敢有丝毫触动的。即便如此,还要受到朝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维新变法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他们把变革的空间拓展到政治体制与教育等领域,开秦汉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之先河。但是,维新变法也没有触动传统文化之根本,没有也不敢触及帝制以及传统伦理的深层次问题。孙中山先生自 1885 年中法战争后就萌发“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7],且毕生致力于制度革命,于文化革命则有所忽略。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是把推翻帝制与恢复汉人政权联系在一起,他的“共和”思想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彻底摆脱大汉族主义嫌疑,至于深刻检讨传统文化,孙中山先生也还没有来得及重视。

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中国人对“革命”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鲁迅先生在《阿 Q 正传》中不仅揭露了革命脱离广大群众的事实,而且刻画了包括上流社会的人们把“革命”镶嵌到传统意识形态因而“恶搞”革命的笑话。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当“共和”到来时,“突然的变化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对眼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难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对的经验。”^{[4]99}于是,封建意识形态、一切旧的规矩和观念凭借其强大的惯性继续驱使着共和时代的人们。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乱象告诉人们:“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仍然是 20 世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双重使命,但是,20 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不可能继续在既往的框架内完成,时代呼唤新的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政治力量来领导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事业。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乱象昭示着鸦片战争后半个或多个世纪向资本主义世界寻求真理的失败。当中国的精英们陷于山重水复之迷茫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点亮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8 年,英国人李

提摩泰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社会进化论》的中文节译本。由于本书的作者在书中提到马克思及其著作,这个英国人便成为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外国人。到20世纪初,留日学生成为翻译有关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力量。虽然他们不是基于政治信仰而介绍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他们作出的重要贡献应当肯定。新文化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重大意义,而此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则直接开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首先是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把“文化革命”放到“社会革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比较彻底地反思检讨传统文化的同时,推进了思想的解放,为新思潮的传播扫除了障碍。几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以其胜利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给摸索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以巨大的启示;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紧跟着学习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理论;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表演,让中国人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尤其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区别。这一切为中国精英们重新选择真理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参照。在现实的强烈的反差中,马克思主义以独特的品质和博大的情怀,给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中国精英们巨大的鼓舞,于是,“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8]。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呼唤。

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是回应时代的呼唤,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以在社会实践中发现的矛盾与问题为起点,通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展开其科学的理论体系。19世纪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暴露,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独到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进一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细致的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以改造世界为己任,毕生都在完善他们的理论体系,并把他们的理论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为此,他们始终密切关

注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动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其全球的眼光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并且对中国问题寄予高度关注。他们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鸦片贸易史》等文章中,不仅高度赞赏中国人的战斗精神,而且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从实践的层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呼唤的回应是正确的。时代需要伟大理论,只有正确地回应时代需要的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大放异彩,彰显并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精英们几乎从西方搬来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库。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验注定要失败,这里有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局限,更有资本主义理论与时代发展特别是与中国国情的根本冲突。反观马克思主义,虽为“迟到”的真理,却是唯一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思想。在她诞生后的半个世纪,始终被人为地拒止在国门之外。从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到深入资本主义大本营考察的大清王朝的官员,都不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以致于有了这样的异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关注中国的问题,而中国人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两年才从传教士那儿知道了马克思其人。到了20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不乏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社会主义等等。在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最早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赢得中国人民的青睐,在斗争中发展,成为20世纪中国的“显学”,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即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本质和实践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必须通过“两个结合”的途径才能够实现她的光荣使命。

“两个结合”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在中国的实践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所谓“人类的彻底解放”(撇开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指人的政治的解放。即把人从落后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摆脱一切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政治自由,使人成为社会的和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指人的思想的解放。即把人从旧的腐朽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摆脱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人的精神(思想)的自由,使

人成为精神上独立的人。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是要从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还要从旧文化中解放出来;不仅要建立一种新制度,还要再造一种新文化。社会革命(核心是制度革命或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实现这种解放的必经途径,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摧毁旧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新制度,才能实现人的政治的自由;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扬弃有着人类历史上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重塑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才能实现人的精神的自由。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要求。世界观是对于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统一,其根本的作用在于“指南”。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也只能是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与具体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走“结合”的道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没有把他们的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真理”,而是相反。早在 1843 年,马克思就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9]恩格斯晚年多次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强调这一立场。1886 年 12 月 26 日,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声称:“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10]586}1895 年 3 月 11 日,恩格斯又在致韦尔纳·桑巴特面雷斯劳的信中明确表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664}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具体的国情基础上才能生根开花结果,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国情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价值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历史担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的,同时也是合目的性的,是“自然历史过程”和“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创造了整个世界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一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代的呼唤、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于历史实践的主体,实践主体的智慧与历史担当是实现这种“结合”的现实性力量的来

源,它决定着“结合”的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共产党作为 20 世纪中国的新生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绝不是偶然的。当中国革命呼唤着科学的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适时地随着纷至沓来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与既往任何政治力量都有着本质区别的政党,一个以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为使命、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价值诉求的政治力量,就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期盼。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一脉相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11]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关联,决定了她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就以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未竟的事业为己任,并以其卓越的智慧,明确了理论选择和发展道路等基本问题。如前所述,20 世纪初,当源于西方的各种学说纷纷涌入中国的时候,要不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如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还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走结合的道路?如此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厘清,都面临着选择。在这个思想大解放,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聆听并正确地甄别、诠释时代的呼唤,作出正确选择,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历史的担当。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有着这样的智慧与担当。他们不仅在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理论地位,而且通过与无政府主义、东方文化中心主义等思想流派的论争,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在一定范围达成了中国应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共识,并且讨论了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从而厘清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如果说,新文化运动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检讨,在一定范围内推进了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则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命和方向。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然的,当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时,他的使命和道路就已经注定了,已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虽然革命的道路艰难曲折,虽然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有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的立场

问题上从未动摇过。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把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仅明确了党要采取苏维埃的形式,而且对党的宣传工作做出了全面的规定。党的“一大”之后,党中央就成立了党的出版机构、创办了一批党的报刊,把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三大运动即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本质上就是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高度统一的革命运动。谁也不能否定我们党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文化革命意蕴和功能。坚持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一贯的立场。毛泽东曾经在1941年的一次讲演中非常坦率地表达了党的这一立场,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2]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才可能成为现实的决定力量,是“两个结合”逻辑起点的决定要素。“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使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然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已经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一百多年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两个结合”也是新时代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根本途径。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 [3] 罗本琦,汪青松,余精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9.
- [4]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5] 黄彦.孙文选集(下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643.
- [6] 罗志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J].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6(4):140.
- [7] 孙中山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01.
- [8] 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6.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29-530.
- [1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wo Combination”

Luo Benqi

Abstract: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orc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20th century to continue to face the dual missions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could not continue on the previous path, and the times called for new theories.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lit up the hop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because it was Marxism that timely and correctly responded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for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owever, the call of the times and the response of theory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only mean tha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at meets the needs. Whether “possibility” can become a reality depends on the wisdom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subject of practice. The mission determines that the CPC must undertake the dual missions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the day of her birth, thus becoming the subject of “Two Combinations”. The call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or new scientific theories,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three has beco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 Chinese revolution;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责任编辑:李应青